

# 拉美文情——阅读印象与记忆点乱

陈众议



罗·博拉尼奥

都说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早已尘埃落定。多年以来,人们无不对巴尔加斯·略萨的“离经叛道”和拉丁美洲文坛的“日渐衰微”感慨系之。盖因此公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叱咤风云的“爆炸先锋”,竞选秘鲁总统败北后竟拂袖而去,成了西班牙公民。不久,被戏称为“巴尔加斯·略萨第二”的埃切尼克也紧随其后,长住欧洲,迄今未回。于是,秘鲁文坛失却了领军人物。同样,智利女作家阿连德长期旅居美国,并把注意力转向了北美的移民问题。硕果仅存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等,则垂垂廉颇老矣。而诗坛更是一片黯淡。

然而,事实并不尽然。首先,巴尔加斯·略萨虽已加入西籍,埃切尼克也常居西班牙不假,却双双均未放弃秘鲁原籍,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则老当益壮、笔耕不辍。其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新一代、新二代作家已然崛起,且风头正旺。前不久,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的著作《拉丁美洲开放的血脉》(又译《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经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之手送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从而引发了国际媒体的热议,并使这部隐居亚马逊网站排行榜六万名之后的作品迅速飙升至西班牙语类图书第一位、英语类图书第二位。其作者也因此而

名满天下。然而,关注拉丁美洲文学的读者当不会对加莱亚诺感到陌生。他自1963年发表第一部文集《来日》至今,已出版各类散文、小说、政论、纪实和时事评论集达三十余种。其中,1964年的《中国》是他对新中国的礼赞,1975年的小说《我们的歌》和1978年的纪实文学《爱情与战争的日日夜夜》则双双获得古巴政府颁发的美洲之家奖。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加莱亚诺笔锋更健。2004年,他以《时间之口》为题,夹叙夹议地抨击跨国资本主义并对“全球化”提出异议,认为“关于当今的全球化世界是一个地球村的说法,无异于一派胡言。对于资本而言,这个世界确实没有边界,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它不仅是有边界的,而且处处壁垒森严。同时,荒谬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这个世界早已怯懦充斥,使人变得麻木不仁”。最近两年,加莱亚诺又先后发表了题为《致未来先生的信》(2007)和《镜子:几乎世界史》(2008)两部著作。前者很难说是散文还是政论,充盈着的是第三世界的忧患和血泪;后者更是一部弱者世界史,所撷取的并非一般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强者的故事,而是相反,即其中的主人公大都是“没有照片或画像、几乎无名无姓的普通人等”。加莱亚诺的文字充满了政治和艺术的双重激情。在《致未来先生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最尊敬的未来先生,我给您写信,并不是为了巴结您。您先生广受众生爱戴,我却是个例外。就像和某个吉卜赛女郎邂逅,我要做的必定是撒腿逃跑,因为我生怕被她逮着小手并赋予诸如此类的残酷。”“可是,神秘的先

生,问题是正在丧失赖以生存的现时世界,强者已经将它变成足球,他们用战火将它把玩,仿佛它是一枚手雷;贪婪者正在将它肆意挤压和吸吮,仿佛它是一个柠檬。这样下去,我怕这世界早晚变成太空中的一粒僵死的顽石,没有田地,没有水分,没有空气,没有生灵。”

类似的写作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现代派,乃至后现代思潮中司空见惯。盖因打破体裁界限的纵横捭阖和夹叙夹议的间离或兼容、虚实相生的杂糅与拼贴等等是最有效的先锋作为。但是,世纪末及世纪之交的某些回归浪潮似乎正在使人淡忘这段风云岁月。于是,加莱亚诺成了传统。老作家富恩特斯同样因袭了这一传统,并在其《鹰椅》(2003)中以覆煮千容的形式对2020年的墨西哥进行了包罗万象的勾画。刚刚作古的智利作家罗贝尔托·博拉尼奥在其代表作《2666》(2004)中也毫不犹豫地因袭了这个传统。但是,小说(姑且称之为小说)与其说令人迁思加莱亚诺的某些作品,毋宁说更具有现代传媒的霸气。或者说它的纵横捭阖传神地演绎了四权治下的当今世界,尽管用的是文字,并诉诸于文字。也就是说,《2666》这个题目只不过是带领现时的读者将着眼点挪到了未来。无论现在你多么风光,可到了那个时候(即六百多年之后),你和所有人物,包括那些自命不凡的记者、作家、各色名流和千万读者都将化为乌有或静静地躺在地下,无人喝彩,甚至无人记起。一如众多世界名著(包括我们的《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这是《2666》在一本正经的叙述、议论、拼贴和环顾中透出的大悲与大彻。美国作家桑塔格生前曾经这样评价《2666》的作者:“他是这一代西班牙语作家中最令人敬佩和最具影响力的。他的英年早逝是世界文学的一大损失。”诚哉斯言!

着眼未来是面对现实的一种姿态和方

后事之师”或者“温故知新,可以为师”。用克罗齐的话说,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于是,无论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巴尔加斯·略萨或富恩特斯,近年也或远或近,把笔触伸向了过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追怀我的那些忧



《2666》英文版封面

伤妓女》(2004)顾名思义是一次回归之旅。巴尔加斯·略萨的《坏女孩的淘气经》(2006)也是一次返老还童。只不过前者只是一个中篇小说,而后者却填满了整整375页。前者在伊朗等国遭到禁止,而后者却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大受欢迎,盖因它在一名血气方刚的女学生的带领下,重温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撼动西方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峥嵘岁月。至于其中的爱情或性爱描写,自然更是见仁见智,难有定论。但是,拉丁美洲文坛的两名宿将终究是心有灵犀,他们又一次不谋而合,走到了一起。虽然二人曾因难以究诘的原委拳脚相向,并反目成仇达三十余年,但在2007年纪念加西亚·马尔克斯八十华诞的《百年孤独》特别纪念版发行前夕,此公曾诚邀略萨小兄弟为其作序,并得到后者的友好响应。从此二人捐弃前嫌,握手言和。同样,富恩特斯近十年以来,也已有两部小说是指向历史或带有回忆色彩的。其中1999年的《劳拉·迪亚斯的年华》意在表现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墨西哥社会,不少人物令人追思弗里达·卡罗、迭戈·里维拉等时代骄子。2001年的《伊内斯的本能》则回到了作家本人的学生时代,其中又以作家曾经就读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为主要舞台,尽管另一条线索是关于浮士德的当代诠释。凡此种种,无不充溢着笃诚的反思,写法上也明显少了些花哨,多了些淳朴。

然而,直面现实无疑是当今拉美文学最显眼的特征之一,也是世界文学最悠久的传统之一。富恩特斯的近作《意志与时运》(2008)即是写墨西哥现实的,背景则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资本的垄断和人格的扭曲。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作,据称是关于古巴革命的,其时间跨度恰好半个世纪,即从古巴革命胜利到卡斯特罗退居二线。同时,年轻一代迅速崛起。他们在传承和创新中逐渐找到了复兴拉美文学的路径。近年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的阿隆索·奎托、埃克托尔·阿瓦德·法西奥林塞、托马斯·埃洛伊·马丁内斯和埃内斯托·基尼奥内斯,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阿隆索·奎托 1954 年生于秘鲁首都利马,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迄今已发表各种文学作品十余部。其中长篇小说《蓝色时刻》(2005)是他的代表作,并被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选为“2006 年最佳外国小说”。小说写年轻律师奥马切博士的一个奇异的发现:他在清理母亲的遗物时,偶然得知了父亲生前担任阿亚库乔驻军司令期间的一段往事:十多年前,秘鲁反政府武装“光辉道路”发动游击战争,而以父亲为首的政府军假平乱之名,行不法之事。他们滥杀无辜,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手无寸铁、自救不逮的印第安土著,而妇女的命运就更加悲惨。奥马切的父亲就曾长时间霸占漂亮的土著少女米丽娅姆,后来,米丽娅姆拼死逃出魔爪,从而一去无踪影,生死两茫茫。为弄清事实真相,或者受潜意识中代父赎罪的情结驱使,奥马切放弃律师工作和体面的城市生活,深入农村,四处寻找米丽娅姆。在历经了无数坎坷与波折之后,奥马切终于找到了“人老珠黄”的米丽娅姆和她身边的一个十几岁男孩。

作品甫出,便好评如潮。有评论称《蓝色时刻》是“日本和服”,虽形式花哨,有悬念,有起伏,但隐藏其后的却是深刻和沉重。透

过父辈犯下的一桩桩罪行,年轻人开始了一系列秘而不宣的灵魂拷问:何为文明、进步?何为原始、野蛮?什么是社会公正?哪里是革命行动和恐怖主义的界限?作品没有结论。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部“反神话”,主人公抛却现代或后现代文明,一步步走向“过去”。他发现,其实过去并不遥远,无论是人是物,原始就在眼前,蛮荒近在咫尺。作品的批判精神和赎罪思想不言而喻。

和《蓝色时刻》相仿,入选 2005 年和 200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最佳外国小说”的拉丁美洲作品,哥伦比亚的《深谷幽城》、阿根廷的《蜂王飞翔》等,也都极具批判色彩和反思精神。《深谷幽城》写南美某地进入“后现代”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人性危机。过去的阶级和阶层在新的分化、组合中显示出令人绝望的模糊。主人公在一个“问题女孩”的带领下,一步一顿地游历了但丁式的天堂、净界和地狱。所不同的是,在作者埃克托尔·阿瓦德·法西奥林塞笔下,天堂与净界、净界与地狱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无论是富豪还是贫民,或者政客、教师及各色人等,无不浑浑噩噩如行尸走肉。于是,但丁超度灵魂的努力在这里终不免付之阙如,因为人物遭遇的大都只是空空的躯壳。

同样,《蜂王飞翔》表现腐败社会中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并以蜂王与工蜂的关系喻示权力的“天然合理性”。小说主人公卡马格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报》的创始人,在阿根廷报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社会上,卡马格是反腐败英雄,有一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但是在报社内部,卡马格却大权独揽,不容许他人有个人意志,即便是情人雷伊娜,也不能越雷池半步,乃至卑鄙地雇人对雷伊娜施暴强奸,最后杀人灭口。直到尾声,他依然逍遥法外,像一只“飞翔的蜂王”。残酷的现实、矛盾的人格,在作者托马斯·埃洛伊·马丁内斯笔下焕发出刺眼的光芒,其“反堂吉珂德”

或“新堂吉诃德”品性昭然若揭。

巴西作家基尼奥内斯的《梦贩子》(2008)是新一届“最佳外国小说”的入围作品,写一个卖梦人及其弟子在当今文明社会的遭际。作品以极大的反讽精神嘲弄了文明的反文明性,从而将现实与梦幻、正常与反常、理智与疯癫等等统统倒了个个儿。

诸如此类,或可说明拉美作家正在奉行的是一种双重的回归,即在回归情节和回归现实主义中走出“爆炸”后的低迷与徘徊。这多少也是文学“背叛父辈、回归祖辈”的惯性使然。而上述作品所凸现的社会责任感和叙事技巧,则分明代表了新一代或新二代拉美作家的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

作为“新侨民文学”的代表,智利女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这只花蝴蝶确实将目光投向了另一脉风景。她的长篇小说《命运的女儿》(1999)写一个智利姑娘在美国的遭遇。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受美国梦的蛊惑,世界各地的淘金者纷纷踏上星条旗覆盖的土地。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个弃婴,长大后爱上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男人不辞而别,她却痴心不改。一天,她终于女扮男装,走上寻找情人的不归之路。先是在一船狂热的淘金者中颠簸,继而与小偷、妓女、醉鬼和流浪汉为伍,以至于梦醒梦灭,不得不开始新的生活。最后,她在一个中国医生的指引下,一步步走向了神秘。作为此书的续篇,《褪色的照片》(2000)是写“第三代”拉美裔移民的。一如《芒果街上的小屋》和《糖果》的作者希斯内罗斯,阿连德这就很有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的味道了。《褪色的照片》在作者的“鹰和美洲豹”三部曲(《怪兽之城》2002、《金龙王国》2003和《矮人森林》2004),以及《佐罗:一个传奇的开始》(2005)和关于十六世纪“命运的女儿”伊内斯的《我的心肝宝贝》(2006)中演化为一系列冒险的神秘或神秘的冒险。她的这种转向也许是受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浪潮或意识

形态(“意识形态淡化”或“终结”)及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和英美新传奇文学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却是她杂色品性的一种炫示。

至于诗坛,则黯淡的不仅是在拉美,恐怕放眼世界也找不出风景独好的一方了。话虽如此,但有心人始终孜孜汲汲、不离不弃。在不久前发表的两部诗集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三个拉美诗群可谓人数众多,声势不凡。其中一部是由阿米阿尔(Almiar)电子杂志编委、秘鲁诗人莱奥·塞拉达编选的,发表时间不详,但应该不会早于2005年,收录对象包括编选者在内的拉美“明星诗人”九名,而由安东尼奥·佩雷斯·莫尔特编选于2006年的《诗集》则收入了五十余位拉丁美洲的“当红诗人”。这些诗人是否当红或如明星般耀眼,只消看一看刊物的发行量和诗集的印数便可知其一二。阿米阿尔虽是网上刊物,但点击量并不高;而佩雷斯·莫尔特的《新诗集》也只不过印行了区区一千册。可见阅读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就像智利诗人马里奥·梅冷特斯低吟的那样:

它是一头倔强的老牛,  
却哞哞着离开了草场;  
回眸那寂寥的草地哦,  
惟有我们反胃的记忆。

——《诗艺》(2004)

尽管西班牙语世界最孚盛名的塞万提斯奖仍不遗余力地奖掖诗人,并一次次地把这个素有“第二诺贝尔奖”之称的荣耀和丰饶(奖金超过六十万欧元)赐予拉美诗人(此前刚刚光临北京的胡安·赫尔曼便是其中之一),但作诗人多于赏诗人的现象至今未见扭转。诗,似乎成了这一日千里的物质世界的一个冬扇夏炉般的终极陪衬。呜呼!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玲)